

彭小莲 著

tamen
de
suiyue

征，戎，年，修，炼，赴，戎，征，
国，事，梦，重，温，乡，国，事，
归，雁，来，画，壁，添，归，雁，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的

城，情，吴，卧，网，罗，人，误，
兵，轻，人，故，达，远，衣，寒，
用，毛，谈，棋，走，里，闲，
一，力，势，名，功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彭小蓮 著

他們的歲月

S u i y u 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FB116 / 1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他们的岁月/彭小莲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0.3

ISBN 7-5321-2028-7

I.他… II.彭… III.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0561 号

责任编辑:修晓林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他们的岁月

彭小莲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k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kcs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180,000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100 册

ISBN 7-5321-2028-7/I·1650 定价:14.00 元

目 录

母亲的形象	5
父亲出事了	19
父亲的童年	30
母亲的家	38
一个愤怒青年	48
另一个愤怒青年	56
加入革命队伍	64
迷茫的日子	69
青灰色的上海	84
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	91
妈妈也加入了革命队伍	99
没有希望的日子	111
不堪回首的年代	119
无法摆脱的阴影	130
1945 年 8 月 15 日的那一天	139
同甘共苦的日子	142
战争结束了	150
父亲出事以后	156

父亲释放归来	168
绵绵久远的苦役	177
生活中最后的寄托	197
最后的消息	210
在洞穴里的日子	218
关于《战争与人民》	230
命运的尽头	248
终于结束了	259

我从纽约回来，一点一点从那里走回到我的土地上来，这里却在一点一点往那里靠近。对于我，路途不再是漫长的，这成了我绵绵久远的欢乐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可是，有时我觉得这也是我绵绵久远的苦役，迷失在这条路上。

一天，一位朋友的孩子，一个在读的中学生对我说，她最恨的是上学，最怕的是考试。一到考试的日子就连着做恶梦，吓得她一身一身地出冷汗。不是梦见考卷上没有字，就是怎么也看不清考卷上的题目。四周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却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趴在桌子上，在那里“唰唰”地不停地写着；这时候，她又偏偏忍不住想上厕所，她真是恨透了自己。紧紧地抓着考卷想把它撕了，但是猛地感觉到，有人站在她的背后，是老师站在那里，一双眼睛在慢慢地爬上她的脊背，然后，一声不响地在那里冷冷地窥视着她。那对眼睛像是长在一条蛇的背上，一会儿穿过了她的身体，从她胸前爬了出来。眼睛趴在桌子上，直直地逼视着她。她吓坏了，感觉到小便已经滴在裤子上，终于惊叫起来。这时，她被自己的恐惧惊醒了……她喘着粗气，张开眼睛，看着黑夜中的家。

她问我：“彭小莲阿姨，你最恨的是什么？你



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全家照，不久爸爸就被捕了。爸爸手上抱着小梅，妈妈抱着才22个月的我

最怕的是什么？”

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因为我說什麼她都不会明白的。仅仅是一代人的差别，仅仅三十年不到的间隔，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我们的仇恨和害怕了，他们甚至对于我们所经历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想象力。但是，对于恐惧，我有着更深的体会。如果要问我，最恨的是什么？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，我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，我恨的事情太多了，于是要说我最恨的是什么，我真的说不出来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我最害怕的是什么——是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时候填表格。这份恐惧远远超出这个中学生的恶梦，只要一看见“家庭出身”这一栏，我就会浑身发冷，不是在夜里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恶梦之中。等我不得不把这一格小空栏填满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已经把自己彻底地撕裂开，是我把自己这个形象扔进了众人的目光之下，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们这样人的身上任意践踏，唾弃。在那里，我甚至没有一块碎布片可以遮拦自己。因为我父亲是彭柏山——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，是胡风分



我们家有五个孩子。老大小钧（后排中）老二晓岑（后排左一）老三小兰右一，老四小梅（前排右一），我是老五（前排左一）

子、现行反革命。

人们常说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

在经历过那段日子之后，我却想说：“反革命”家里的孩子早觉悟。

在那个年头，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，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，我是十分清楚的，那就是家里说的，出去不能说；真实的事情，只能放在心里想想，绝对不能说出来；带文字的东西，最好不要保留，特别是书信，看了要烧；搞任何政治运动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，开口的时候，一定要拥护；不管什么组织，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；心里想的，一定不能落在纸上；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，但是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。

就这样，我们生存下来了。

我们家有五个孩子，我排行老五，最小。我的大姐姐彭小钧，1965年大学毕业，因为出身不好，分配到南京钢铁厂炼钢车间，做炉前工。哥哥彭晓岑，因为转移爸爸写的长篇小说《战争与人民》，1968年春天，在大学里被打成反动学生，然后被抓了进去；出来以后，于1969年被送去甘肃天水县劳动。二姐彭小兰66届高中生。她是最幸运的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她那里，只是到1968年夏天，被分到上海远郊奉贤县“五四”农场。三姐彭小梅，1968年的春天（那时候，她才15岁，一个在上初中的孩子）被作为反动学生批斗，同年秋天到云南插队。1969年4月，我被分配到江西插队。这时，父亲已经死了。母亲关在隔离室有一年多了，我们几乎没有她的任何音信。我们的家，就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没有任何告别，没有任何抗议，没有任何声音地涣散掉了。

看着我们这样破碎的家庭，就像看着一张伤痕累累的老脸，上面不仅布满了皱纹，而且有着深深的疤痕。这些疤痕将整张脸撕得支离破碎，已经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了。脸上的目光显得凄厉无神，嘴角丑陋地挂在边上，表情是固定不变的，最可恶的是，那张脸已经不会展现出笑容。就像是《巴黎圣母院》小说里，那个钟楼上的丑八怪，不堪入目。

现在我走在自己的脸上，开始把那些伤疤一点一点地重新撕裂，看着黑色的鲜血在那里慢慢地滴落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感叹，甚至没有抱怨。在父亲死的那个时刻，我就越来越意识到“认命”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。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，如果我们不想为难自己，我们就该早早地学会认命。

可是更多的时候，只要一想到父母，想到他们的一生，我的心里却会涌出无限的惆怅，无限的愤怒，而这一份不该是我这样年纪还会产生的激动，却依然存留在我的情绪之中。怎么可以、可以让一个人——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就这么被侮辱被损害地走完了他们的生命？我无法再征得他们的同意，只跟大姐小钧说：“我想写写爸爸妈妈的事情。”

小钧在长途电话里回答我说：“写吧，有很多事情要写。还有，写写小舅舅，他就是因为爸爸的原因，在部队里被送上军事法庭，被打成了右派……”

对，还有小舅舅。那么我的大伯和二伯呢？

太多太多了，何止是我们家的这些亲戚，还有爸爸妈妈的朋友和熟人……我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了他们的生活，就像在阅读宣判死刑的公告。当我把这一张公告和着我父亲、母亲真实的面目一起贴出来的时候，不管他们是多么残酷，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，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，但是，我想，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在慢慢地学会说真话。

母亲的形象

我的母亲朱微明，这个名字对于她来说，几乎成了多余的。人们在称呼她的时候，总是习惯地听到人们管她叫“彭柏山的臭老婆”。

那是1967年11月底的时候。还可以说是秋末的季节，可

是，想到它的时候，我总记得那一天很冷很冷。早上天没有亮，妈妈走进我们的屋子，跟我和小梅说：“今天在电影局开我的批斗大会。”

我们都还睡在被窝里，我裹着被子坐了起来。没有等我开口，妈妈又说：“我没有做任何坏事，你们不要害怕。毛主席说的，‘我们要相信群众，相信党’。”那时候，母亲一直在跟我们说这句语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语录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，这句话被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过亿万次了，我们早就忘记了语录本身真实的涵义。妈妈说这话，也未见得有什么思考。但是她在给自己打气。谁都不知道，在批斗会之后，生活里又将发生什么事情。

满街的大字报，满街的毛主席语录，满街的毛主席肖像。连书店、文具店、甚至是布店和食品店的橱窗里，陈设的都是毛主席的巨幅肖像，还有他的语录。食品店的柜台里常常是空空的，有的时候也在那里出售毛主席著作和语录，到处能听见高音喇叭在叫喊着革命口号。下午的时候，我和小梅跑到电影局去了。我们俩是高高兴兴跑去的。我不知道是我们真的是那么头脑简单，还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。反正，我们是很快地跑去了。那时候，电影局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上，电影局旁边的电影广告牌上，糊着大字报和巨幅大标语，其中有一条是“把胡风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臭老婆朱微明揪出来示众”。墨迹还没有干，好几个字都被淌下来的墨汁拖得长长的。

我和小梅都看见了标语，我们俩不再笑了，但也没有说什么，并不像人们描写到“文革”时，总是那么痛苦的样子。真的，一点都不痛苦，我们先是在街上奔跑，看小分队演出，又



1953年，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，父亲接任夏衍的职务，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

和着红卫兵游行队伍到处乱窜。后来我们又挤在人群中张望，朝电影局里面张望。那天批斗的还有瞿白音、白杨、张骏祥、沈浮，好些个名人。电影局的门口涌了很多很多的人，水泄不通。现在都没有人会相信，有那么多人跑来看热闹。试问一下有谁是来干革命的？大家跑来是来看“大明星”白杨，看名人张骏祥他们的。人头涌动，没有人大声说话，但是都往电影局的门口挤。那扇门是木制的，紧紧地关闭着。偶然之间，我听见有人在问：“看见白杨了吗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“唉，谁是彭柏山啊？”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我甚至有一份失落，怎么人们并不认识爸爸。他出事太早了，在50年代就出事了，那会儿还不像“文革”，没有那么多关心政治。有人在边上解释：“最早的上海宣传部长。他是胡风分子，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。”“他的臭老婆是干什么的？”“不知道。”

父亲不是上海最早的宣传部长，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夏衍。1952年，爸爸从24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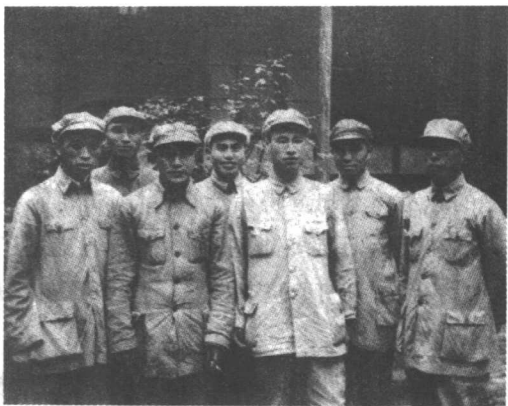
长。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,但是他不到任,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,他是常务副部长。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,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,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。1953年,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,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。

爸爸离开部队的时候,24军军长兼政委的皮定均,爸爸最亲密的朋友、战友,当时不在部队,上北京开会去了。当他回来听说爸爸已经接受了调令时,拍着桌子说:“这个柏山真是糊涂,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。他一个书生,哪里搞得过他们啊!”

在我懂事的时候,就开始听见妈妈这么说。而每一次听她说的时候,总能感觉到她刻骨铭心、痛心疾首的样子。直到最后的时刻,直到40年过去以后,直到妈妈病危在床上的时候,她还在说:“要是皮司令在那里就好了,他是不会放你父亲走的。你父亲要是不离开部队,皮司令是一定会保他过关的,他就不会卷进去……”说着说着,她会蜷起已经变形的手,在那里拍打着床沿。“你父亲这个人,就是让皮司令说透了,他就是个书生,哪里会搞什么政治啊。我看是他自己不好,他还是想到地方上去。想去搞什么文化艺术。不去,就好了……不去,他就不会被他们弄死了,我们这个家,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……”

走错这一步,爸爸永远不愿意再去回忆。他只是说:“我和老皮是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。只有他,是真正为我好。一辈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,也是我最后的安慰。”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?皮司令这样好的人,一个真正的军人,也在“文革”中去世了。

这是唯一在“文革”后保留下来的爸爸和皮定均伯伯的合影。右一是爸爸，后排中是皮定均伯伯。摄于松江24军军部



不论他们再说什么，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

只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妈妈说对了。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：“政治是很可怕的，也是最肮脏的。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，不要搞政治。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，这才救了我，也救了我们这个家。”

解放后，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译制片厂任俄文翻译，没有任何官职。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在影片结束，在“译制人员”的字幕栏上，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，她是被划为另册的翻译。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，实在是去“陪斗”的，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，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。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，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，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，刚刚够卡车开进电影局，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。

我和小梅一直等到天黑，人群早早地散了，但是没有看见妈妈他们出来，更没有看见任何卡车开出来。我们回到家

里的时候，屋子里空空的，妈妈也不在。坐在黑暗中，我问小梅：“你说会出事吗？”“不知道呀。不会吧。”我们对出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，但是黑暗的黄昏，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安，一种恍惚。我们在那里胡说着，猜测着，实在是不敢有太多的思考。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，哥哥晓岑跑到电影局去的，突然在晚上七点多钟，晓岑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门。

我跑去开灯，晓岑说：“不要开大灯，开那盏小台灯就可以了。”

黑暗中，我一回头，看见一个头已经被打得肿胀起来的母亲，她的眼镜被打碎了，红肿的眼皮耷拉在那里，掩盖着已经开始瞳孔放大的眼球，她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。她一路走，一路歪歪斜斜地在那里探路。眼球像是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。晓岑搀扶着她也没有用，这好像不再是她的家了，她什么都看不清楚。

我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非常不懂事地问道：“妈妈，你会死掉吗？”这时，小梅也在那里哭。妈妈好不容易躺倒在床上，几乎是奄奄一息的人了，她什么都没有回答我们。

晓岑很不高兴地对她说：“不要在这里哭，要哭到隔壁房间去哭。听了烦人不烦人啊。”

从电影局出来的时候，晓岑试着把妈妈送到淮海医院，但是，医院坚决不接受她这样身份的病人，坚决拒绝给她这样的人治疗。因为她是反革命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大楼里住了一个医生，我对妈妈说：“我到四号去，让匡医生来看看你，好吗？”

妈妈无力地点了点头。（写到这里，我只觉得还是要附带

地提一下匡医生，虽然我对她并不了解，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说不全。我只知道，她一生没有结婚，是那种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，为人客客气气，总是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她穿着很讲究，但是又落落大方，显得既朴素又有派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个子不高，长得很漂亮。我好像都没有和她说说过什么话。那时候我太小了，一个13岁的孩子，怎么够得上跟她说话呢。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，她能有什么话要跟我这样的毛孩子说？1969年的春天，她也被批斗了。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，回家以后，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气针，自杀身亡。去世的时候，还不到50岁。）

我跑去敲她门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。她在门上挂上了链条，开了半扇门，探出半个脸在门后看着我。她不认识我。

我说：“我是楼上21号的，我妈妈被打伤了。你能不能来看看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很紧张。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个“打”字表达出来，但是，不说是不可行的。她看着我，很平静地说：“你先上去，我等一会儿上来。”话音刚落，她就迅速地将门合上了。我回家后和妈妈一起在那里等待着匡医生，等了一刻钟，她没有来。我问妈妈：“她会不来吗？”妈妈又一次无力地点了点头，我又开始哭起来。在那个时候，和我们这些人沾上关系，实在是灾难。晓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，这时候，他也在一边默默地哭了。突然，听见有人敲门，小梅急忙跑去开门，没有想到匡医生来了。她拿了一个小手电筒走了上来，一进门看见妈妈的样子，已经明白了一切。她什么都没有问，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向她解释。晓岑要我给匡医生倒水，但是匡医生没有答理我们，她翻开了妈妈的眼皮，用手电筒在那里

照了照，然后说道：“左眼底大面积出血，一定要去医院，要把血止住。不然眼睛会瞎的。”然后，匡医生捧着妈妈的脑袋，轻轻地在那里翻动着，查看着。晓岑告诉匡医生：“妈妈的右手疼。”匡医生又很小心地抬起妈妈的手臂，妈妈痛苦地皱起了眉头，匡医生一点一点在手臂上摸着：“这里最疼，是吗？”妈妈点了点。匡医生回头跟晓岑说：“右手腕骨折。你们家有木板吗？我先给她固定一下，今晚无论如何要去医院。她明显脑震荡。如果脑子内部还继续出血的话，要出人命的。”木板拿来了，但是妈妈身上穿的棉毛衣已经把打肿的身体紧紧地箍着，脱不下来。匡医生用剪刀剪开了妈妈的衣袖，然后给妈妈的手臂上了夹板。

母亲的手表壳也被打裂了。后来，妈妈告诉我们，她是被拉到后台，造反派站在边上看着，一个女的，（当我分到上影厂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女的就在厂长办公室对面的打字间工作，我看见她的时候，也和大家一起管她叫老刘，我不知道就是她）跑了上来，一把揪住妈妈，接着剥掉了妈妈身上的棉衣和毛衣。在冬天，就让她穿着贴身的棉毛裤和棉毛衣站在一群男人的面前。然后举起宽宽的军用皮带，狠狠地朝她身上抽去。妈妈居然还会跟她争个理，妈妈说：“你是共产党员，你怎么可以打人？”老刘大声地说道：“告诉你，我打的是阶级敌人，我这就是阶级报复。”说着，她重新举起皮带，那上面的大铜扣子，直直地朝妈妈的头上砸去，划过脸颊往下落，一下又一下，一直打到妈妈昏了过去。妈妈跟我们说：“她要报复我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跟她一起工作过。”那时候的人，用现在的逻辑去想，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。与其说是在干革命，不如说是在演戏。真真假假之中，谁都说不清，这戏是演给谁看的。